

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

選堂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編
魏晉南北朝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

臺灣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編
國語文學系文學研究所附設文學系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編
魏晉南北朝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

文史哲出版社
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
學系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文史哲，民
83
面；公分
ISBN 957-547-919-X(平裝)

1. 中國文學 - 六朝(222-588) - 論文, 講詞等

820.903

83011646

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

主編者：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正雄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一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平裝定價新臺幣五六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547-919-X

《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

編輯委員會

鄧仕樑主任

鄭健行博士

楊鍾基先生

蔣英豪博士

黃坤堯博士

文史哲出版社

1994

序

鄧仕樑

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文學發展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這時期開始了文學的自覺，引起了文學求新求變的傾向，在五言詩、辭賦、駢文、小說、文學理論各方面，都有空前的成就。

可是在唐代以後，不少人對這個時期存有偏見。有些偏見可以說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後半，而且有愈來愈嚴重的趨勢。其中原因非常複雜，也許正是當前要探討的課題之一。

民初以還，中華民族面臨種種危難。憂患之感既深，務實之情彌篤。無論從事創作或研究者，大都主張文學的功能在於反映社會，培養愛國家民族的情操。這和儒家「興、觀、羣、怨」之旨很接近。又儒家論文，重質實而不主雕琢，與近世論文者基本反對唯美文風，可謂不謀而合。因此雖然不乏優秀的學者，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研究，卻不能算發達，而且跟宋代以來的看法，沒有太大的改變。這時期除了黃侃、劉師培、黃節及其諸弟子的著述外，魯迅在1927年發表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是研究魏晉文學最重要的一篇論文。¹此文對魏晉文壇和文人種種現象作了深入分析和解釋，與一般泛作批判的文章有所不同。四十年代王瑤撰成《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學風貌》、《中古文學思想》三書，也以探索和解釋現象居多。王氏自稱《中古文人生活》主要是繼承《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加以研究闡發的。²比起有些研究

1 魯迅文收在《而已集》中。

2 見王氏之書自序，序文作於1948年。

者，如胡適以爲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只是「詩匠」³、陸侃如、馮沅君二氏以爲潘陸都是「低能詩人」，是「同樣的不高明」⁴，王氏的論述是客觀得多了。陸馮二君對此時期的詩歌，下了一句很簡要直截的判斷：「此時詩歌的基本思想，大都是不健全的。」⁵可以代表一般輕視低貶六朝詩者的態度。

1949 年以後，中國大陸和臺港兩個華文地區，對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研究，有不同的趨向。

中國大陸標舉文學爲工農兵服務的口號，不少學者以爲六朝文學只代表貴族士大夫心聲。通行的文學史，雖不否認此時期文學在藝術技巧上的進步，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定了政治標準第一，文藝標準第二，因此處理古典文學，往往把「現實主義」作爲衡量的標準。對於六朝，很容易得出「形式主義」、「不能反映民生疾苦」等結論。翻檢 1949 至 1966 年間的論文，有關六朝文學的研究，少得跟別的時代不成比例。倘若把範圍收窄一點來考察，譬如以宮體詩爲例，也許更容易看到研究取向。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資料室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室合編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索引 1949—1966》（增訂本）⁶，列舉了文革前古典文學研究論文篇目，其中研究六朝山水詩的論文尚有十餘篇，有關宮體詩的一篇也沒有。洪順隆主編《中外六朝文學研究文獻目錄》所輯中文日文有關宮體詩及《玉臺新詠》論文十餘篇中，無一是中國大陸學者之作。⁷似乎宮體詩是當時學術研究的禁區。

文革期間，古典文學研究走進了困境。此時極端強調「思想內

3 胡適：《白話文學史》，香港：應鐘書屋，1959 年，頁 95。

4 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年，頁 342 及 351。

5 《中國詩史》，頁 335。

6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索引 1949—1966》，香港：三聯書店，1980 年。

7 洪順隆主編：《中外六朝文學研究文獻目錄》，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 年。

容」，要求一切作品主題先行，六朝文學自然更遭歧視。但文革以後，文學研究有蓬勃氣象。六朝的研究，恢復得很快。研究範圍也有所拓展，能注意過去不會注意的問題，在方法上也趨向嚴謹，少作主觀空泛的判斷。

此時最值得注意的，是文學觀念改變了，能夠反省過去的態度。八十年代初已有文章指出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學術界流行對魏晉南北朝文學貶斥的觀點，其實那些作品中值得繼承和借鑑的地方還是不少的。⁸也有人分析六朝文學的歷史地位，認為六朝是新的文學高潮到來之前的孕育期。⁹其後章培恒在1987年發表了《關於魏晉南北朝文學的評價》一文¹⁰，章氏在分析了五十年來忽視六朝的原因外，並提出了新意見。他認為在魏晉南北朝文學中，人的自我意識加強是最令人矚目的。這表現於對個人價值新的認識，和對違背傳統道德觀念的個人欲望的肯定，因而呈現出新的鮮明顏色。另外章氏提出此時期文學的特色，是文學與哲學的結合，並以創造「美」為文學的首要任務。此文發表後，引起了廣泛注意，有關報刊或全文轉載，或摘要刊登，但也有反對的意見。¹¹可見要求重新評價六朝文學，在中國大陸是一樁大事情。發表章文的學報編者，認為意見分歧，不僅表現在對魏晉南北朝文學的評價問題上，

8 如卡齊《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情況簡介》中關於「魏晉南北朝文學的評價」一節，《文科月刊》1984年第8期，頁28-29。曹道衡《談談魏晉南北朝文學》，《文史知識》，1982年第7期；《再談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幾個問題》，《光明日報》1982年11月30日。

9 葉幼明《六朝文學的歷史地位》，《湖南師院學報》，1982年第3期。

10 《復旦學報》（社科版），1987年第1期。

11 其後有劉世南《究竟應該怎樣評價南北朝文學——與章培恒同志商榷》一文（《復旦學報》社科版1988年第1期）。劉文指出章氏「誤入歧路」，並認為章文問題的關鍵，主要就是抽掉了文學的政治性亦即階段性。章氏隨後發表《再論南北朝文學的評價問題——兼答劉世南君》一文（《復旦學報》社科版1988年第2期），文中在開始即表示：「在近幾年的學術討論中，這樣的聲音已經很不容易聽到。」

還涉及究竟應該以甚麼標準來評價文學，如何看待文學傳統等大問題。

1949年以後的華文地區臺灣和香港，初期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五四以來的文學觀，並沒有對六朝發生太大的興趣。但早年在臺灣大學任教的學者，不少曾承教於黃侃、黃節諸先生，經過多年耕耘，奠定了六朝文學研究的基礎。一方面，這些地區不必遵行大陸的文藝路綫；另一方面，外來的資訊比較易得。因此臺港在文學研究方面，自成一個局面。近三十年臺港研究生的畢業論文，以六朝為研究對象的不少。有些大學設立了六朝文學研究小組、六朝文學研究室等專門研究單位。

至於近代日本學者，對六朝文學的重視是明顯的。黃侃在北京大學和中央大學講授《文心》、《文選》之際，鈴木虎雄正在日本京都從事《文心雕龍》和《玉臺新詠》的研究。其弟子吉川幸次郎和斯波六郎分別在京都大學和廣島大學展開了六朝文學研究，加上其他學者的努力，其成績是有目共睹的。

再看看西方學術界。西方學者研究六朝文學，既沒有附和貶低六朝的意見，也不認為有為這時代辨解的需要。霍克斯教授1961年在牛津大學中文講座教授就職演講中，以六朝詩人與唐代詩人並論，指出其內在價值及重要性，並不亞於先秦諸子的著作。¹²大抵用西方的文學觀去考察六朝文學，會傾向於肯定這個時代很有值得研究之處。例如近年在一本研究六朝詩歌的英文著作序言裏，作者指出在早期中國，政局動亂往往引發豐富的文學想像。六朝詩人

12 見 David Hawkes, "Chinese: Classical, Modern and Humane,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24 May 1961", 此文收在 *Classical, Modern and Humane* 書中 (edited by J. Minford and S.K. W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3 見 Kang-i Sun Chang, *Preface to Six Dynasties Poet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有高度的個人觸覺，能把困擾的政治形勢轉化為詩歌靈感。又謂除了表達自我，六朝詩人更關注外在世界的瑰奇，因此也善於刻劃自然。¹³ 這些觀點跟中國傳統以為衰世之音，難有雅正之調，因而加以鄙棄的態度，簡直是背道而馳的。

這裏再以宮體詩為例，看看中外研究取向和文學觀念的差異。宮體詩在傳統學者眼中，大遭咎病。論詩者提到宮體詩，似乎覺得不痛罵幾句，不免有失體統。到了四十年代，更有聞一多的大力攻擊，認為「這時期卻犯了一樁積極的罪，它不是一個空白，而是一個污點」。¹⁴ 流行的文學史，沒有一本不對宮體詩大加排斥的。數年前出版的一本古籍詞典，全書千餘頁，收古籍近五千種。凡例說明凡流傳至今有籍可徵的古代主要典籍，均在收選之列，尤側重文史及綜合參考類古籍。¹⁵ 根據該書宗旨，從保存資料的角度看，《玉臺新詠》也是極為重要的總集，但該詞典卻沒有收錄，可見一時還沒有改變長久以來的成見。反觀日本和西方，則對宮體詩完全沒有偏見。日本學者對《玉臺新詠》全書作解釋或譯注的，就有鈴木虎雄、日泉內之助、小尾郊一等幾種。西方則在八十年代出現了《玉臺新詠》全譯本。¹⁶ 譯者 Anne Birrell 在序文中指出自隋代以來，《玉臺新詠》備受攻擊，時至今日，猶有餘響，如非有近代漢學大家如鈴木虎雄的研究，此書可能湮沒無聞。使她大惑不解的是，一般攻擊宮體詩者，指這些詩有賣弄技巧、用典、雕琢等等毛病，其實這些正是詩歌的特點，正是其可貴之處。在序文中作者更坦然提出：用不正確的批評標準去評價宮體詩是徹底的錯誤。這裏比較詳細徵引《玉臺新詠》譯者的意見，旨在提出研究者的背景和觀念不

14 聞一多《宮體詩的自贖》，原載《當代評論》第10期，收在《唐詩雜論》書中，《聞一多全集選刊》之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頁11。

15 《簡明中國古籍詞典》，長春：吉林出版社，1988年。

16 Anne Birrell, *New Songs from a Jade Terrace*, Penguin Books, 1986.

同，對研究方向有決定性的影響。

上文略述幾個地區、時期的研究概況，當然有過分簡單之弊。但在文學研究的意義說，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跟研究其他時期，甚至研究用其他語言作為媒介的文學，有共通的地方。我們對文學的意義、功能、價值儘管有各種各樣的看法，但倘若文學研究這回事，在不同的地區可以指完全不同的心智活動，到底是大大的憾事。意見分歧是不能避免的，研究方法也儘可各行其是，但如果有機會交流觀摩，虛心參考他人的研究態度和成果，總可以尋求共同的語言，或者至少知彼知己，認清自己的路向。

就目前情況看，大陸和臺灣既同屬華文地區，在資訊發達的今天，溝通必然日漸頻密，這有助於意見交流和資料搜集。只要保持開放的態度，文學觀念容易趨向於接近。這不是說要放棄傳統的研究方法。¹⁷但古典文學研究者，至少該有權從文學的角度去看文學。有了這樣的共識，就有可以理解的取向。我們相信，今天學術界對文學有比較一致的認識，更適切的方法，觀念上也不再囿於成見，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研究，一定引起各地區學者更大的興趣。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同人中，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有好幾位。我們不自量力，在紀念中文大學成立三十週年之際，籌辦「魏晉南北朝文學國際研討會」，原意在向前輩和時賢請益問學。藉著交流討論，把六朝文學的研究往前推進一步，是我們的願望。以魏晉南北朝為專題的研討會，在香港這還是第一次。據中國大陸來的

17 研究方法本來沒有絕對的優劣，主要應該看其在於解決問題是否適合。如法國漢學家 Donald Hozman 是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學者，他原是新批評大師 Wimsatt 的弟子，但認為新批評、結構主義、解釋主義、解構主義都不適用於中國文學，因為中國文學深刻地嵌入歷史中，中國詩人非常傾向於自傳式，要理解詩歌的內容，必須緊扣自傳式的特點進行研究，詳見《海外學人專訪錄》，載《文學遺產》1989年第4期。當然這只是 Hozman 個人的意見。今天的文學研究者，應該擴展視野，虛心學習，然後用他能夠掌握的最適合的方法，不必唯新是尚，也不能故步自封。

學者說，大陸還沒有舉辦過這個專題的會議。臺灣近年定期舉行魏晉南北朝學術會議，而研究的對象，不限於文學。我們人力有限，經驗不足，幸賴學術界賢達不吝賜予指導，又蒙友校不少學者惠然肯來，擔任研討會主席等任務。回想起來，籌辦的過程還算順利。

值得高興的，是這次研討會集合了不少各地六朝文學專家。他們有早負時譽的學者，在六朝文學研究有領導地位；也有一些比較年青的學者，他們努力不懈，未來肯定有更光輝的貢獻。遺憾的是有些學者原先計劃來港參加的，可是由於種種原因，結果不能出席。譬如開會兩星期前才接到楊明照教授來信說來不了，這是非常可惜的。

在這裏要特別感謝北山堂基金利榮森博士，沒有他的慷慨支持，這個研討會不可能辦成功。

作為籌備委員會主席，我還要感謝中文系同人包括老師、同學、職員的通力合作，在有限的資源下，不辭勞苦。一年後這本論文集得以出版面世，也是羣策羣力的結果，謹在此再三致謝。

一九九四年夏日序於沙田

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

目 錄

序	鄧仕樑	v
從對立角度談魏晉南北朝文學發展的路向	饒宗頤	1
郭璞詩爲晉「中興第一」說辨析	周勛初	9
論六朝敘事詩	洪順隆	29
梁朝邊塞詩小論	劉漢初	69
陶淵明與白居易	松岡榮志	83
論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	鄧仕樑	87
《文選序》疑義答問	屈守元	119
蕭統《文選》研究述略	穆克宏	125
《文選》編纂實況研究	清水凱夫	141
由京都賦之發展見魏晉京都之時代精神	高桂惠	165
出題奉作——曹魏集團的賦作活動	鄭良樹	181
論謝朓的宣城情懷	楊承祖	211
魏晉南北朝艷情文學的組成及其評價	孫琴安	225
魏晉南北朝詩書畫之關係	陳華昌	239
略論江淹《恨》《別》二賦之對偶	韋金滿	273
論顏延之對鮑照的貶評	鄭健行	295
徐庾文學平議	王仲鏞	301
徐陵論	道坂昭廣	321
魏晉南北朝散文研究之重要性	王更生	327

《水經注》之寫景藝術研究	方麗娜	339
陶淵明對王安石的影響	王晉光	359
《文心雕龍》「比興」觀念析論	顏崑陽	369
「文心」與「雕龍」——	馮春田	399
有關《文心雕龍》文章美學的探索		
《文心雕龍》修辭理論對後世的影響	蔡宗陽	415
《文心雕龍》作家論略析	陳志誠	429
水火意象與儒道佛的虛靜說——	黎活仁	447
有關《文心雕龍·養氣篇》一個問題的考察		
曹植：思捷才俊，詩麗表逸——	李瑞騰	455
《文心雕龍》作家論探析之二		
六朝文論札記三則——對某些詞語、句子的理解	楊明	465
魏晉南北朝的文原論	鄧國光	485
操斧伐柯——試論《文賦》所帶出的詮釋矛盾	朱耀偉	495
六朝小說與《晉書》之關係初探	王國良	505
陳郡陽夏謝氏——六朝文學士族之個案研究	程章燦	529
晉末宋初的政變和謝氏文學	佐藤正光	561
南朝崇佛文學略論	蔣述卓	575
陶淵明的歷史情懷和歷史述作	楊鍾基	591
論任昉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曹道衡	607
詩緣情而綺靡——陸機《擬古》的美學意義	黃坤堯	623
魏晉南北朝文學國際研討會程序表		645
與會學者名錄		649
魏晉南北朝文學國際研討會工作人員名單		651
後記	鄭健行 黃坤堯	653

從對立角度談 魏晉南北朝文學發展的路向

饒宗頤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複雜混亂的時代，也是一個承先啟後的時代；從三國的鼎立，到南北朝的對峙，又是一個對立的時代。除了是政治的對立，還有思想的對立和文字的對立。思想的對立，主要表現在廟堂和山林的對立；換言之，在野的想出來做官，做官的卻想退隱。文字的對立，即是胡與漢的對立。這樣的對立，貫串了整個時代；而文學的發展，便在這對立情況之中，有著各種各樣的表現。

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最大發展，是「集部」的形成和推進。集是收集的意思，除了彙集個人的作品，還把別人的作品收集累積。過去是沒有這樣的「集」的名目，漢人是把思想性、政治性或各種的文章組織成集，是屬於「子部」的。魏晉南北朝以來的集就不同了，這種蒐集的工夫，我們把他叫做 collective work。除了個人自己蒐集以外，還有奉詔采集的，例如裴松之注《三國志》，據《宋書·裴松之傳》記載，是宋文帝命裴松之采三國異同作注。裴松之於是「奉旨尋詳，務在周悉」，「鳩集傳記，增廣異聞」的了。這個時代，王家和私家都紛紛從事輯集的工作，集的發展就成為南北朝文學的特徵。

我認為魏晉南北朝文學如此的多姿多采，文字上胡漢的對立亦是一個重大關鍵。所謂「胡」，在漢代是指匈奴，魏晉以後，已不止是匈奴了。這時代的胡語，印歐語系，連帶伊朗語系也包括在內了。從敦煌經卷中的佛教經典，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當時的胡語究竟

是甚麼樣的了。在胡、漢對立中，歷史上有一件事，是大家都未曾注意的，就是漢靈帝時，中國開始盛行胡化。《後漢書·五行志》說「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爲之。」而這個所謂胡者，事實也不單是指印度的。在語言文字的胡漢對立當中，首先面對的是繙譯的問題。關於內典的繙譯，梁朝僧祐（《文心雕龍》作者劉勰的老師）《出三藏記集》，輯釋道安《大品般若經序》，文中提到「五失本三不易」的說法，就是討論佛經的繙譯問題。在胡漢的繙譯中，胡人曾有很大的推動力；其中最有成效的，我認爲不是鳩摩羅什，而是更早期的支謙和康僧會二人。支謙是月支人，其父於漢靈帝時歸化中國。他「十三學胡書，備通六國語」。（《祐錄·支謙傳》）在孫權黃武元年（222）開始繙譯佛經，至孫亮建興中（252—253）共譯了四十九部之多，他的譯文非常優美。至於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趾。十餘歲出家。」（《祐錄·康僧會傳》）他在孫權赤烏十年（247）來到建業，並開始繙譯佛經的工作。他譯的《六度集經》，文字好得很。康僧會是以文言來繙譯的，文字水平極高，其風格又與支謙不同。我認爲做繙譯的人，應該先通一種文字，再通別種，這樣的繙譯才好。我們看錢鍾書的繙譯文字非常好，我就說是他的中文好，中文比英文好，所以他繙譯法文、德文都是那麼好。因此，繙譯之功，支謙、康僧會二人當在鳩摩羅什之上。有了繙譯以後，對文學視野的拓展，起了很大的推動力。

在胡漢對立的問題上，駢文也有很密切的關係。駢文的前身，就是駢字。清雍正時編了一部《駢字類篇》，他在序文解釋駢字的意思，「比事屬辭，蓋駢文義也。」六朝時代，駢字的發展特別多，像《世說新語》中就有不少駢字，在《文學篇》舉一個例子說：「桓玄下都，羊孚時爲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賤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蕪，明公啟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流。』」其中睽離、淪蕪，都是駢字。有人統計《世說新語》裏頭的駢字有一千五百四十一個，還